

ZHONGGUO GUDAI JINGJI LUNLI SIXIANG SHI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

思想史

唐凯麟
陈科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ZHONGGUO GUDAI JINGJI LUNLI SIXIANG SHI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

思想史

唐凯麟
陈科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洪琼 方国根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顾杰珍

责任校对:周祖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唐凯麟 陈科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01-004563-1

I. 中… II. ①唐…②陈… III. 经济学-伦理学-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3262 号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

ZHONGGUO GUDAI JINGJI LUNLI SIXIANG SHI

唐凯麟 陈科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3.625

字数:323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01-004563-1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西周: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 的产生	(21)
一、原始宗教习俗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蕴涵	(21)
二、“敬德保民”的德治主义取向之形成	(30)
三、德性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	(39)
第二章 管仲、子产和晏婴的经济伦理 思想	(51)
一、管仲的经济伦理思想	(52)
二、子产的经济伦理思想	(65)
三、晏婴的经济伦理思想	(69)
第三章 孔子: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的产生	(79)
一、“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	(80)
二、富国教民的生产观	(90)
三、“均而安”的分配观	(97)
四、黜奢崇俭的消费观	(101)

第四章	孟子:儒家理想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	(106)
一、	“何必曰利?”的道义论	(108)
二、	“恒产”与“恒心”的辩证观	(116)
三、	“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论	(121)
第五章	荀子:儒家现实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131)
一、	“下富则上富”的富国论	(132)
二、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的价值论	(141)
三、	“明分使群”的管理伦理	(151)
第六章	墨子:有为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159)
一、	“义,利也”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160)
二、	“赖其力者生”的生产观	(172)
三、	“自苦为极”的消费观	(179)
第七章	道家:自然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189)
一、	老子:“无为”的“寡欲”论与“宝俭”论	(190)
二、	杨朱:“贵己”、“养生”的消费伦理	(200)
三、	庄子:“有机事必有机心”的技术伦理	(206)
第八章	法家:法治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214)
一、	“挟自为心”的人性论	(215)

二、重本抑末的生产伦理观	(226)
三、“民众而货财寡”的人口伦理	(231)
四、奢侈“养殃”的消费观	(237)
第九章 秦汉时期经济伦理思想的嬗变	(241)
一、黄老之学:儒道经济伦理思想的结合尝试	(242)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经济伦理思想	(251)
三、司马迁: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	(261)
四、《盐铁论》: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意识形态化	(269)
第十章 魏晋至隋唐:儒家经济伦理的失灵与再造	(278)
一、享乐主义与“名教”危机	(279)
二、“钱神论”:拜金主义	(283)
三、《太平经》——道教的经济伦理思想	(286)
四、佛教的经济伦理思想	(291)
五、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复兴	(296)
第十一章 宋明理学: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 最高形态	(303)
一、周敦颐的“义利理欲”之辨	(305)
二、张载的“寡欲”论	(307)

三、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	(309)
四、朱熹的“义利、理欲”之辨	(312)
五、理学经济伦理思想的消极影响	(316)
第十二章 宋代: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之崛起	(320)
一、李觏: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前驱	(320)
二、王安石:新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	(335)
三、陈亮与叶适:新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	(344)
第十三章 明代: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新走向	(359)
一、丘濬的“各得分愿”论	(360)
二、张居正的“厚商利农”思想	(371)
三、陆楫的“禁奢之辨”	(376)
四、“泰州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378)
第十四章 明末清初:早期启蒙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387)
一、黄宗羲:“工商皆本”论	(389)
二、顾炎武:“用私”论	(395)
三、王夫之:“理欲”统一论	(398)
四、“颜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409)
五、唐甄的“富民”论	(413)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416)
后 记	(424)

导 论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无疑是近代以来的产物,但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则早已存在于古代中外思想家的思想中。然而,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由于受近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是否包括经济思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知识论的标准来评判,甚至发展到以是否具备一种知识论体系——如是否有经济“学”、哲“学”——来衡量一种思想的有与无。从这种知识论出发,自然会得出中国古代不存在哲学思想、经济思想的结论,更遑论有中国经济伦理思想了。然而,如果我们不将这种知识论标准绝对化,不以是否具有知识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为评判一种思想有无的标准,而是承认人类对于经济现象的关注具有多种方式和维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不仅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而且还有着更为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伦理化乃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显然,研究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学,便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

经济现象作为社会生活的客观事实,由于它始终是以“问题”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

的形式呈现的,反映了人与自然交换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的矛盾状态,因而对其进行思考便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焦虑之一。但是,由一种心理焦虑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理性思索,并以这种理性思索的结果去指导和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这只有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是可能的。同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人类一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就面临着阶级的分野,这便使得人们对于经济现象的思索中掺杂了某种价值诉求的因素,也就意味着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性思考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纯粹的体现效益优先原则的知识经济学式的思考,而是一种与物质利益的分配密切相涉的政治经济学式的思考,这一事实也就决定了“效率与公平”必然成为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母题。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在不同的经济时代,“效率与公平”这一母题的展开及其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表现形式会有很大差异。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人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换活动只能在一种狭窄的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因而“效率”问题并不构成经济思想的主要问题所在,甚至可以说,自原始农业产生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虽然在单位面积的产量上有着不断的升级与提高,但真正影响农业经济效率的因素,从主体方面讲,是生产技术的改进,如铁农具与牛耕的使用,从客体方面讲,是自然界的风调雨顺与否。两者相较,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它使得自然经济成为一种典型的“靠天吃饭的经济”。由于经济效益问题的主导权在“天”或自然,便使得人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顺天而行,即按自然规律办事。如“不违农时”就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一个“绝对命令”,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需要政府在历法方面予以指导之外(《夏历》就是一部“农时”之历,故孔子主张“行夏之时”),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从制度上保障“农时”不受诸

如筑城、修陵、打仗等徭役、兵役和杂役的影响,这种所谓的“轻徭”政策是历代封建王朝所特别标榜的“德政”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如何顺民而行,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必须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所考虑和关注。这一点正如西周末年大夫芮良夫所言:“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国语·周语上》),即政府应该成为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调节者,否则若“利”只为某一个阶层所“专”或垄断,则不仅会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而且还会导致社会的冲突,从而影响皇朝的兴亡。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从皇朝自身的长治久安出发,政府都应该承担起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职责。由此可知,在自然经济条件中,在等级结构制度中,对经济现象的考量往往不会是一种现代意义的纯经济学考量,而是一种政治学考量,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思想,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经济问题化约为一个政治问题,用传统的话语来说,是一个“王政”问题。这一点即使在崇尚知识论的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也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学即“家政学”(Oikomoika)作为一种“理财之术”,虽然与“政治学”不同(后者是关于政治制度的学说),但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却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学》与《伦理学》两本著作之中,这一事实说明: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经济学仍然属于政治学或伦理学的范畴。它与中国古代的“王政之道”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站在“家”(微观)的立场去理财,而后者则是站在“王”(宏观)的角度去理财。这种微观(家)与宏观(王)的差别固然对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但是,很显然,原初意义的经济学(无论是“王政学”或“家政学”)都未脱出政治学的范畴之外。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这种知识论谱系及姻缘关系也内在蕴含着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另一种向度,即伦理学思想。当然,学术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

界对此多有疑虑。而这种疑虑又多源于许多人把经济伦理思想视为一个近代命题,以为近代以前则无所谓的经济伦理思想可言。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如上所述,“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母题”决定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共源性关联,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念,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使“家庭”财富不断增加的学问或技术,而政治学是一种有关国家制度设计的学问。很显然,在亚氏那里,“家”(family)与“国”(state)并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同构性,这就决定了古希腊奴隶制时代的家庭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富家”,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使人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亚氏认为,所谓“优良的生活”就是要使城邦内的每一成员都具有适量的财富、健康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等,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体制上必须实行“共和政体”。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实际上具有消解其经济学只限于“家政”范围的积极意义。基于这样一种“政治”理念,亚里士多德对于色诺芬提出的经济学即家政学观念做出了修正。他认为,只有那些为了满足人类生活必需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如农业、畜牧业才是“合乎自然的”经济,而商业、高利贷等则是一种“不符合自然的”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应该关注的是前者,而后者则属“货殖学”或“牟利学”的范畴。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政治学不仅包含着经济学的考量(使城邦成员拥有“适量的财富”),而且包含着“伦理学”的考量(使城邦成员具备“高尚的道德”——最高的善业);同时,当他用所谓的“合乎自然的”经济来修正传统的“家政学”时,所用的实际上仍是一把伦理学的剪刀。可见,尽管亚里士多德从形式上对经济学与政治学、伦理学作了一种知识论的区分,但从其内容来看却又强调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可以用西方学者这样一种概括:“古希腊的道德哲学细分为伦理学、政治

学和经济学”。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宗法一体、家国同构的特征,使得中国传统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承担着比较复杂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家政”的重心不在于如何“理财”,而在于如何“齐家”,在于如何维系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齐家”之道乃是一种政治之道,同时又由于中国古代将孝悌之道作为实现“齐家”的主要途径,所以它又是一种伦理之道。而从“国”的角度来讲,传统的“王道”政治以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理想,而且强调礼乐与仁义道德是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主要途径,孔子将这种“王道”政治称之为“德政”。这无疑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伦理化的特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传统的“齐家”之道虽然其政治伦理取向比较突出,但这并未完全地遮蔽其经济学的承担。从《尚书·酒诰》所谓“肇牵牛,远服贾,奔走事厥养父母”之语可知,“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要求包含着如何通过事农、经商等经济活动来致富以使父母免于物质生活匮乏的困扰等内容在内。这一点是传统的“治生之术”——一种以强调私人财富不断增殖的经济学——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同样,在传统的“王道”政治中,“富国之道”和“富民之道”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于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孔子的“庶、富、教”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后者是把使城邦的每一成员都具有适量的财富、健康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等三个方面作为“优良的生活”的主要内涵,而孔子所举的三个方面中除了“庶”(人口数量的增长)与亚氏的“健康的体魄”(人口质量的加强)稍有差异之外,其他两个方面是相同的,而且二者都没有把物质文明作为人类生活的终极性目的,而是将道德文明当做了最高的善。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未能如亚里士多德那样从知识谱系的角度将之与政治学、伦理学区分开来,但是我们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

不能以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来否认这样一个中西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共性,即经济、政治与伦理三者是同宗而共源的。因此,只要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着经济思想这一事实,就必须同样承认有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存在。

还须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虽然由于伦理思想的过度张扬而弱化了其经济学的意义,并使得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德性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但是,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还存在着功利主义一脉,且这种经济伦理思想在秦汉之后的发展又有着与儒家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渗透的趋势,这样,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便不只是一种单纯的道德主张,还包含着一种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关怀。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始终是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双向关注下不断深入的。尽管科斯洛夫斯基认为,近代以来,道德问题有一种缩小成经济学问题的趋势。^①但是,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发展史表明:科氏所担心的伦理学被经济学所取代的趋势并未形成,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包含着更为自觉而深刻的伦理关怀,以至于伦理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不可或缺之维。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思想与其经济学的发展同西方并不是同步的,中国古代未能产生出亚里士多德那样对知识谱系进行严格分类的哲学家,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并未以一种“经济学”即一种知识论形式而出现,这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不足,但正是这种不足,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伦理学内涵更为突出,当然,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伦理的经济学”性质。

^① 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二、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宋明清时期。

(一)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经济现象的伦理考量发生于西周之初,它与西周初期思想家在“殷鉴意识”的观照下所确立的以“敬德保民”为内涵的德治主义价值取向有关。西周的思想家提出了诸如“孝养父母”的生产观、不独专于“利”的分配观和“恭俭惟德”的消费观等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但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西周礼乐社会结构的解体,王官之学逐渐为诸子之学所代替,从而出现了以“义利之辨”为主要命题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经济伦理思想发展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基本上呈现为两条线索:

一条线索是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春秋早期,管仲从“人本自利”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仓禀实而知礼节”的道德生成论观点,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儒家创始人孔子“罕言利”不同的是,墨子则大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提出了“义,利也”的功利主义命题,试图在“公利”的层面将“义利”统一起来,并将此命题延展到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领域,奠定了中国古代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之始基。战国时期发端于道家思想的杨朱功利主义则从“贵己”、“为我”的价值取向出发,提出了“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的主张,其功利主义思想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性质,成为中国古代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异端”。此外,

韩非子在继承李悝、商鞅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自为心”人性论为基点,将社会的一切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换算成一种利益交换关系,提出了以法治为特征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法家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是其集权政治学说在经济伦理学领域的延伸,其特征是强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绝对控制。比较上述诸子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墨子讲“利”而不害“义”,杨朱唯自“利”是图,法家则是唯君主之利是从。三者之功利主义经济伦理学说分别体现了“为民”、“为我”与“为君”的价值取向。

另一条线索则是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孔子从仁学出发,高举“义利之辨”的大旗,明确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命题,确立了“见利思义”的德性主义价值取向,但是,孔子对于“民之利”,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利”等等的伦理正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富国”、“富民”的生产观、“均而安”的分配观和黜奢崇俭的消费观等经济伦理思想。不过,从整体来看,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仍只是其仁学思想的展开,属于一种经济的道德本质论观点。孟子在继承了孔子“义利之辨”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何必曰利?”的命题,从而将经济问题完全化约为一个“仁义而已”的问题。不过,孟子的政治学视野又使他提出了具有唯物色彩的“恒产恒心”论,以及“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论,这些理论反映了孟子对于君子人格构建的心理基础与物质基础的充分自觉。与孟子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经济伦理思想相比,荀子作为儒家的“另类”则显得现实得多,他以“富国”为目的,以“富民”为手段,提出了著名的“下富则上富”论;并从性恶论出发,既强调“以义制利”,又认为“义与利”乃人之所“两有”;还提出了“明分使群”的管理伦理思想。荀子的经济伦理具有上承孔子下

启汉儒的意义。

(二) 汉唐时期: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

汉唐时期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与鼎盛时期。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秦之后,以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儒家思想为主来整合其他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特色之一。西汉初所推崇的“黄老之术”实际上是试图以黄老思想来整合其他思想,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也实际上是以儒家思想来糅合其他各家。这种不同思想的冲突和融合的关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先是以“名教”与“自然”为主题的玄学,后是佛教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融合,都具有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辨异的特点。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汉唐时期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亦具有儒道互补、德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冲突和融合的特点。如董仲舒从“天人合一”观念出发,一方面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命题,而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荀子的“义利两有”论,主张义利“两养”。正是对“利以养其体”的关注,董氏还提出了“度制”论经济伦理思想,并主张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再如司马迁,他既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人性思想,认为“富者,人之情性,人所不学而能者也”,又继承了管子的“仓禀实而知礼节”的道德生成论,认为“人富而仁义附焉”,并将“富”区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个层次,认为前两者之“富”本身即蕴含着“德”,鼓励人们追求财富,提出了“善者因之”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学命题。再如汉代的思想家们围绕着“轻重之辨”而在盐铁会议上所展开的斗争,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各种思想融合的特点,特别是代表儒家的“文学”,提出了所谓“抑末利而开仁义”的口号,这不仅一反孔子所确立的重商传统,而且也表明了儒家由一个“罕言利”、耻于言利的道德理想主义者